

TECHNOLOGY

The Surrender of Culture to Technology

科技奴隸

Neil Postman 著

何道寬 譯

科技主人？ 被科技綁架？

科技發展日新月异，人人追隨科技的腳步
唯恐落後，但是到底是科技服務人，
還是人成為科技的奴隸？



當代最傑出的社會觀察家、媒體評論
大師，**尼爾·波斯曼**，挑戰科技掛帥的
代表性著作。

專業推薦

陳世敏 董事長／財團法人卓越新聞獎基金會

馮建三 教授／政治大學新聞系

羅世宏 主任／中正大學傳播學系暨電訊傳播研究所



社會意識

004

科技奴隸

Technopoly

The Surrender of Culture to Technology

尼爾·波斯曼 著
何道寬 譯

本書譯文由北京大學出版社授權繁體字版出版發行

Copyrights © 1992 by Neil Postman

This translation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Alfred A. Knopf, an imprint of The Knopf Doubleday Group, a division of Random House, Inc.

Complex 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 © 2010 by Goodness Publishing House

◆社會意識◆ 004

科技奴隸

Technopoly: The Surrender of Culture to Technology

作者 尼爾·波斯曼 (Neil Postman)
譯者 何道寬
發行人 楊榮川
總編輯 龐君豪
企劃主編 陳念祖
責任編輯 李敏華
封面設計 王璽安
出版 博雅書屋有限公司
地址 106台北市大安區和平東路二段339號4樓
電話 (02)2705-5066
傳真 (02)2706-6100
劃撥帳號 01068953
戶名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網址 <http://www.wunan.com.tw>
電子郵件 wunan@wunan.com.tw
法律顧問 元貞聯合法律事務所 張澤平律師
出版日期 2010年4月初版一刷
定價 新臺幣280元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科技奴隸 / Neil Postman著；何道寬譯。-- 初版。-- 臺北市：博雅書屋，2010.04
面：公分。
參考書目：面
譯自：Technopoly: The Surrender of Culture to Technology
ISBN 978-986-6614-32-3 (平裝)
1.科技社會學 2.技術發展 3.全球化
440.015 98007782

譯者前言

他們（波斯曼的學生）都知道，自己是麥克盧漢的孩子。當然我也認為自己是他的後代，不是很聽話的一個孩子，可是這個孩子明白自己從何而來，也明白他的父親要他做什麼。

——尼爾·波斯曼

這篇序文準備回答六個問題：(1)什麼是媒介環境學？(2)麥克盧漢和波斯曼主張技術決定論嗎？(3)什麼是技術壟斷？(4)技術壟斷為何在美國興起？(5)什麼是波斯曼的警世危言？(6)今日怎麼讀本書？

一 什麼是媒介環境學？

本書是媒介環境學（media ecology）領域的經典之作，也是波斯曼媒介批評的三部曲之一，其餘兩部是《童年的消逝》和《娛樂至死》，中譯本均已在近年問世。本書出版之後，

[1]〔加〕菲利普·馬爾尚：《麥克盧漢——媒介及信史》，何道寬譯，二〇〇三年版。

這個三部曲便完成了中國之旅，我們研究波斯曼和媒介環境學就有更加堅實的基礎了。

波斯曼是媒介環境學的第二代精神領袖。媒介環境學這個術語的首創者是麥克盧漢，但正式使用者是尼爾·波斯曼。一九七〇年，他根據麥克盧漢的建議在紐約大學創辦了媒介環境學專業和博士點。

起初，大陸學者和旅美學者包括我本人，都把media ecology直譯為「媒介生態學」，引起了一些混亂。以麥克盧漢等人為代表的傳播學研究和國內學者創建的「媒介生態學」不是一回事。北美這個學派關心的是技術、媒介對文化的影響，國內學者關心的是媒介尤其是媒體的經營和管理，屬於傳播政治經濟學派。

廣泛地說，傳播學可以分為三大學派：經驗學派、批判學派和媒介環境學派。經驗學派注重實證研究，長期雄踞北美的傳播學界。批判學派的代表有德國法蘭克福學派、英國文化研究學派和傳播政治經濟學派，以新馬克思主義者和其他左翼學者為骨幹。媒介環境學發軔於二十世紀初的相對論思想，經過二代學人的開拓，已然進入傳播學的主流圈子。

波斯曼本人對媒介環境學下過這樣的定義：「媒介環境學研究人的交往、人交往的訊息及訊息系統。具體地說，媒介環境學研究傳播媒介如何影響人的感知、感情、認識和價值，

研究我們和媒介的互動如何促進或阻礙我們生存的機會。其中包含的「環境」^[2]一詞指的是環境研究——研究環境的結構、內容以及環境對人的影響。畢竟，環境是一個複雜的訊息系統，環境調節我們的感覺和行爲。環境給我們耳聞目睹的東西提供結構，所以，環境就構成我們耳聞目睹的事物的結構。」^[3]

二 麥克盧漢和波斯曼主張技術決定論嗎？

世人對麥克盧漢最大的誤解莫過於所謂「技術（媒介）決定論」，就在媒介環境學者內部，也有人不能夠理直氣壯地否定這一頂帽子。他的私淑弟子保羅·萊文森即爲一例。萊文森對麥克盧漢的認識和評價有一個發展過程，經歷了三個階段。一九七九年，他在《人類歷程回顧：媒介進化理論》這篇博士論文裡斷言，麥克盧漢主張「技術決定論」，立即遭到麥克盧漢的反駁。一九九七年，他在《軟利器：自然歷史與資訊革命之未來》裡判斷，麥克盧漢主張「硬」決定論，他本人則主張「軟」決定論。到了一九九九年的《數位麥克盧漢》，

[2] 即「ecology」，本書把「media ecology」譯為「媒介環境學」。

[3] 轉引自Casey Man Kong Lum ed., *Perspectives on Culture, Technology and Communication: the Media Ecology Tradition*, Hampton Press, Inc., 2006, p.214。

他大幅度調整了對麥克盧漢的評價，他的結論是：麥克盧漢的思想未必是媒介決定論。他說：「如今，用事後諸葛亮的眼光來看問題——在後視鏡裡回顧他，回顧我最初對他的研究——我可以清楚地看見，用『媒介決定論』來描寫他未必是妥當的。」^[5]他又說：「在這個領域，我和麥克盧漢已經有兩點不同。然而殊途而同歸，我們的結論都是一個開放的、不可預測的、不可規範的未來。」^[5]

和大多數學者一樣，筆者對媒介環境學和「技術決定論」，也有一個認識過程。我也長期把伊尼斯和麥克盧漢視爲「技術決定論者」，直到最近幾年。

二〇〇三年，在《天書能讀：麥克盧漢的現代詮釋》裡，我寫下了這樣一段話：「麥克盧漢絕對不是鼓吹技術決定論的人，他是要我們回歸身心一體、主客一體的理想境界。麥克盧漢不僅是當代人的朋友，而且是子孫後代的朋友。他是一個面向未來的人，預言希望的人。」^[6]

人們之所以誤解麥克盧漢，那是因爲他們沒有認真研究他的天鵝絕唱《媒介定律：新

[4]〔美〕保羅·萊文森：《數位麥克盧漢》，何道寬譯，二〇〇一年版。

[5]〔美〕保羅·萊文森：《數位麥克盧漢》，何道寬譯，二〇〇一年版。

[6]何道寬：《天書能讀：麥克盧漢的現代詮釋》，二〇〇三年。

科學》。在與他兒子合著的這本書裡，麥克盧漢試圖一勞永逸地建立有關媒介演化規律的理論，他提出媒介演化的四條定律：提升、過時、再現和逆轉。他認為每一種媒介都有這四種功能，都在不斷轉化之中。這是辯證法的思想，符合馬克思主義的否定之否定規律，也絕不比黑格爾「正」、「反」、「合」的定律遜色。它怎麼能夠被貶低為「技術決定論」呢？

馬克思強調經濟地位和經濟關係決定人的社會存在，並以此判斷歷史的走向，有人因此而給他扣上一頂「經濟決定論」的帽子，這是不對的。同理，麥克盧漢強調技術（媒介）對社會、文化和心理的影響，我們據此硬說他主張「技術（媒介）決定論」，也是不妥當的。

技術是雙刃劍、浮士德的交易，利弊皆有，毀譽參半，既是普羅米修斯盜取的火種，也是潘朵拉打開的盒子，既給我們饋贈，又讓我們付出沈重的代價。每一種技術都既是包袱又是恩賜，不是非此即彼的結果，而是利弊同在的產物。這似乎是人盡皆知的普世真理，其實不然。人們對技術影響力的評估之所以有差別，那是因為有人傾向樂觀，有人傾向悲觀，但他們僅僅是對技術利弊的強調有所側重而已。一般來說，不同的意見並非南轅北轍、各執一端、水火不容，絕對的樂觀主義和絕對的悲觀主義都不存在，人們對技術的樂觀、悲觀態度，只是程度不同而已。有人說，在技術與文化的關係上，麥克盧漢傾向於樂觀主義，波斯曼傾向於悲觀主義。不少學者還暗暗把媒介環境學派的大多數學者都想像為「技術決定論者」。這未必是妥當的。

波斯曼是一個印刷文化人，他堅守印刷文化，警惕電子文化對文化素養的侵蝕。令人稱奇的是，他終身只用鋼筆或鉛筆寫字，從來不用打字機和電腦。他從來不作即興講演，也不用提綱應付講話，他堅持用手寫的方式書寫一切講稿、論文和書稿，而且寫完全文，不用提綱。與此同時，他又是講故事的一流高手，課堂教學令人傾倒，所以我們說，他又是口頭文化人。

他高揚人文主義的旗幟，旗幟鮮明地主張現實關懷、人文關懷和道德關懷，與麥克盧漢自稱的道德中立分道揚鑣，而且揭示麥克盧漢言論背後深刻的道德關懷和宗教情懷。在這一點上，他不是麥克盧漢「聽話的孩子」，所以他說：「麥克盧漢本人的著作裡就有強烈的道德判斷傾向。」^[7]

一九八二年，波斯曼在《童年的消逝》裡抨擊電視文化，捍衛印刷文化，感歎電視文化抹殺成人和兒童的界限。於是人們說，他是悲觀主義者。

一九八五年，他在《娛樂至死》裡控訴電視對讀寫能力的戕害，影射電視掏空了人的頭腦和心靈。人們似乎更有理由說，他是悲觀主義者。

[7] 「加」菲利普·馬爾尚：《麥克盧漢——媒介及信史》，何道寬譯，二〇〇三年版。

一九九二年，他在本書裡高呼「狼來了」，揭示唯科學主義和資訊失控的現實危險，指控技術壟斷對美國文化和人類文化的危害。你能說他主張「技術決定論」嗎？

他用這個媒介批評三部曲為我們敲響警鐘，那是因為他悲天憫人、憂心忡忡，害怕失去豐饒的文化遺產。

波斯曼和自己的同事甚至學生論戰，他不僅反對「技術決定論」和「悲觀主義」的帽子，而且反對把社會研究說成是社會「科學」，反對把統計學等自然科學的實證主義研究方法硬塞進智商測量、民意測驗等社會研究領域，反對把人文科學和社會研究變成所謂社會「科學」。他痛恨失去道德關懷的人文社科研究。

一九九八年，波斯曼在媒介環境學會的成立大會上做主題報告，題為「媒介環境學的人文關懷」。這既是媒介環境學的宣言書，又是他個人的自白書。他借此機會簡明扼要地闡述了媒介環境學的由來和宗旨，旗幟鮮明地張揚媒介環境學的現實關懷、人文關懷和道德關懷，嚴厲批評缺乏道德關懷的傾向。

在這裡，波斯曼提出四條人文主義原則，用以指導媒介研究和傳播研究：(1)媒介在多大程度上對理性思維的發展做出了貢獻？(2)媒介在多大程度上對民主進程的發展做出了貢獻？(3)新媒介在多大程度上使人能夠獲取更多有意義的資訊？(4)新媒介在多大程度上提高或損害了我們的道德感和我們向善的能力？

既然他以如此嚴厲的態度拷問技術和媒介，你能夠說他主張技術決定論嗎？

他在本書的壓軸戲裡宣告：「人類進步的故事是一個樂觀主義的故事，並非沒有苦難，但占主導地位的是令人震驚的一次又一次的勝利。」（頁一八八，除特別標注外，本序引文均為英文版頁碼）你還能夠說他是悲觀主義者嗎？

在上述講話的結尾，波斯曼直截了當地批評與會同事和弟子中間忽視道德關懷的傾向：「依我的理解，媒介環境學的全部重要命題是，它要推進我們的洞見；我們何以為人，我們在人生路途中的道德關懷上做得怎麼樣——在這些問題上，媒介應該有助於推進我們的洞察力。你們之中有些人可能自信是媒介環境學者，但不同意我這一番話。如果真是這樣，你們就錯了。」^[8]這是他對年輕一代學者的善意警告和諄諄囑託！

波斯曼是印刷文化人的典範，他對電子技術的負面影響憂心忡忡。他主張媒介環境的完美平衡：語言環境、感知環境、媒介環境、多重媒介環境和社會環境的平衡。在道德關懷上，他的立場和言論都比麥克盧漢更加旗幟鮮明。一句話，波斯曼絕對不提倡「技術決定論」。

[8] 轉引自Casey Man Kong Lum ed., *Perspectives on Culture, Technology and Communication: the Media Ecology Tradition*, Hampton Press, Inc., 2006, p.66。

三 什麼是技術壟斷？

波斯曼戲稱自己是「麥克盧漢的孩子」，卻又「不是很聽話的孩子」。他接受麥克盧漢的建議，在紐約大學創建「媒介環境學」學科點和博士點，把麥克盧漢的思想發揚光大，所以他是「麥克盧漢的孩子」。他抨擊「技術壟斷」，成爲呼號吶喊的旗手，與盲目「樂觀派」劃清界限，這是他「不聽話」的主要表現之一。

他繼承了盧梭、梭羅、赫胥黎、喬治·奧威爾、羅馬俱樂部悲天憫人、警鐘長鳴的傳統，彷彿在說：「人們，你們要警惕啊！」他批評丹尼爾·貝爾、阿爾文·托夫勒、約翰·奈斯比特、保羅·萊文森那種過分樂觀的調子，所以他在上述講演中旗幟鮮明地說：「你們錯了。」

他闡明技術壟斷的危害，認爲技術壟斷是對傳統尤其是印刷文化和文化素養的侵蝕。那麼，什麼是技術壟斷呢？他對技術壟斷做了簡明的界定，追溯其淵源，警惕其走向。以下是他對技術壟斷多角度的描述：「任何技術都能夠代替我們思考問題，這就是技術壟斷論的基本原理之一……所謂技術壟斷論就是一切形式的文化生活都臣服於技藝和技術的統治。」（頁五十二）「技術壟斷是文化的『愛滋病』（AIDS），我戲用這個詞來表達『抗資訊缺損綜合症』（Anti-Information Deficiency Syndrome）。」（頁六十二）

和伊尼斯、麥克盧漢一樣，波斯曼用技術和媒介的演化來劃分人類歷史。他認爲：人

類文化的發展可分為三個階段，即工具使用文化階段、技術統治文化階段和技術壟斷文化階段；人類文化大約也分為相應的三種類型，即工具使用文化類型、技術統治文化類型和技術壟斷文化類型。

他追溯技術和人類文化敵友關係的消長。他認為，技術和人的關係是亦敵亦友的關係，但他死死地盯著技術的陰暗面，警惕技術對人造成的危害。

他描繪了這種敵友關係的大致走勢。在工具使用文化階段，技術服務，從屬於社會和文化，技術不對人構成危害。然而，隨著技術的發展，技術的潛在危害有加大的趨勢。到了技術統治文化階段，技術開始向文化發起攻擊，並試圖取而代之，只是尚不足以撼動文化而已。遺憾的是，進入技術壟斷文化階段，技術的突飛猛進、一日千里，使資訊的暴漲失去控制、泛濫成災，產生了大量的資訊垃圾，使人難以辨別孰優孰劣、孰好孰壞，甚至使人無所適從，「使傳統世界觀消失得無影無形，技術壟斷就是極權主義的技術統治。」（頁一三〇）

技術、媒介和傳播有偏向，這樣的偏向造成不同歷史階段的不同知識壟斷。在這個問題上，他繼承並發揚了伊尼斯和麥克盧漢的思想。波斯曼所說的媒介「意識型態偏向」就是對伊尼斯「傳播的偏向」、麥克盧漢「媒介即訊息」的繼承和發展。他說：「每一種工具裡都嵌入了意識型態偏向，也就是它用一種方式而不是用另一種方式建構世界的傾向，或者說它

爲一種事物賦予更高價值的傾向；也就是放大一種感官、技能或能力，使之超過其他感官、技能或能力的傾向……這就是麥克盧漢的警語『媒介即訊息』的意思……在手握榔頭者的眼裡，一切都彷彿是釘子……在手握鉛筆者的眼裡，一切都像是寫下的清單；在拍照人的眼裡，一切都像是圖像；對使用電腦的人來說，一切都像是資料；對手握成績單的人而言，一切都像是數字。」（頁十三至十四）

波斯曼對技術和文化做了這樣的斷代：工具使用文化從遠古到十七世紀，技術統治文化濫觴於十八世紀末瓦特蒸汽機的發明（一七六五年）和亞當·斯密《國富論》的發表（一七七六年），技術壟斷文化濫觴於二十世紀初。

在工具使用文化階段，人和技術大體上是友好的關係。他認爲，此時工具在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兩方面比較好地服務於人的需要。（頁二十三）

到了技術統治文化時期，技術和人的關係開始逆轉，但並未完全顛倒過來。「在技術統治文化裡，工具在思想世界裡扮演著核心的角色。一切都必須對工具的發展讓路，只是程度或大或小而已。社會世界和符號象徵世界都服從於工具發展的需要。工具沒有整合到文化裡面去，因爲它們向文化發起攻擊。它們試圖成爲文化，以便取而代之。於是，傳統、社會禮俗、神話政治、儀式和宗教就不得不爲生存而鬥爭。」（頁二十八）

技術統治文化肇始於中世紀的三大發明：時鐘、印刷機、望遠鏡。機械鐘產生了新的時

間觀念；印刷機使用活字，攻擊口頭傳統的認識論；望遠鏡攻擊猶太——基督教神學的根本命題。

技術統治文化成熟於現代科學和現代產業的背景下。他認為培根是技術統治時代第一人：「佛朗西斯·培根生於一五六一年，他是技術統治時代的第一人……他把科學從九霄雲外拉下來放到地球上……培根就成為新思想大廈的主要設計師。在這幢大廈裡，聽天由命的態度被拋到窗外，上帝被送進一間特製的房間。這幢大廈的名字叫進步和力量。」（頁三十五至三十六）

他徵引培根和馬克思的話作為技術統治文化的佐證。

培根在《新工具》裡謳歌三大發明：「……印刷術、火藥和磁鐵，它們改變了整個世界的面貌和事態。印刷術改變了文學，火藥改變了戰爭，磁鐵改變了航海。由此而產生了無數的變化；在此，沒有一個帝國、一個教派、一顆星球對人類事務施加的力量和影響，堪與這些變化一較高低。」（頁三十六至三十七）

在技術統治時期，文化並沒有向技術投降。「技術統治文化並沒有完全摧毀社會的傳統和符號世界的傳統。它僅僅是把社會傳統和符號世界置於從屬地位，甚至使之受到羞辱，但它不可能使這些傳統失去效力。」（頁四十五）「技術統治文化沒有摧毀工具使用文化的世界觀。」（頁四十七）

然而，到了技術壟斷時期，技術與人的關係就幾乎完全顛倒過來了。

技術壟斷的思想肇始於哲學家奧古斯特·孔德和巴黎高等技術學院的一群科學家。「孔德創建了實證主義和社會學，努力建構關於社會的科學。他主張，凡是不能看見和計量的東西都是非真實的，無疑，這個主張為後世把人當做客體的觀念奠定了基礎。」（頁五十二）

技術壟斷興起的標誌有三個：(1)汽車大王福特發明裝配線，這使人淪為機器的奴隸。(2)一九二五年夏天，美國南方的「猴子審判」，這是上帝造人論的失敗和生物進化論的勝利。(3)一九一一年泰勒《科學管理原理》問世，許多人相信科學管理、實證研究能夠解決一切問題，一切問題都必須依靠實證研究；科學至上論如日中天，社會研究淪為自然科學的附庸。

他認為，唯科學主義有三個互相聯繫的觀念，是技術壟斷論的基石：「我所謂唯科學主義是三種互相聯繫的觀念……第一個不可或缺的觀念是，自然科學方法可以用來研究人類行為……第二個觀念是，社會科學揭示的原理可以用來在合情合理的基礎上組織社會。第三個觀念是，科學可以用作一個全面的信仰系統，賦予生命意義，使人安寧，使人獲得道德上的滿足，甚至使人產生不朽的感覺。」（頁一四七）

技術壟斷的現實威脅是：資訊的失控、泛濫、繁瑣化和泡沫化使世界難以把握。人可能淪為資訊的奴隸，可能會被無序資訊的汪洋大海淹死。

電視時代和電腦時代產生了新的知識壟斷，電視人和工人正在形成對普通人的巨大優

勢。面對洶湧而來的新技術，贏家和輸家都齊聲喝彩的局面是不正常的。「輸家出於無知爲贏家歡呼雀躍，現在的情況依然如此；這實在是令人困惑、使人心酸。」（頁九）「電腦對普通人有多大的好處呢？他們的隱私更容易被強大的機構盜取。他們更容易被人追蹤搜尋、被人控制，更容易受到更多的審查，他們對有關自己的決策日益感到困惑不解；他們常常淪爲被人操縱的客體。他們在泛濫成災的垃圾郵件裡苦苦掙扎。他們容易成爲廣告商和政治組織獵取的物件。」（頁十至十一）

這是波斯曼描繪的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初資訊失控和知識壟斷的危害。在二十一世紀初，這種令人不安的局面就改善了嗎？

四 技術壟斷爲何在美國興起？

本書的宗旨是描繪並分析技術何時、如何、爲何成爲特別危險的敵人。作者對美國的科技壟斷持尖銳批評的立場，他認爲：「美國文化是唯一的技術壟斷的文化。這是一種年輕的技術壟斷文化。我們可以假設，它不僅希望只此一家，而且希望把持最發達的地位。因此，它小心提防日本和幾個正在努力成爲技術壟斷文化的國家。」（頁四十八至四十九）

波斯曼從美國的歷史、文化、國民性、資源、信念體系的巨變中去追尋技術壟斷興起的原因。他闡明了四個相互關聯的條件。